

五四文学的生成与可能

岳凯华 著

WUSI WENXUE DE SHENGCHENG YU KENENG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五四文学的生成与可能

岳凯华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四文学的生成与可能/岳凯华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6

ISBN 978-7-80752-373-4

I. 五... II. 岳... III. 新文学 (五四) —文学研究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8976 号

五四文学的生成与可能

岳凯华 著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周文炯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电话: (028) 83191287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373-4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文学的发生背景	(1)
第一节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1)
第二节 现代文化观念的滥觞	(12)
第三节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24)
第二章 五四文学的生成策略	(32)
第一节 渐进式的文学改良	(33)
第二节 断裂式的文学革命	(45)
第三节 功利与审美的互渗	(54)
第三章 五四文学的发展路径	(66)
第一节 文言的颠覆	(67)
第二节 白话的张扬	(92)
第三节 “人的文学”的标举	(106)
第四章 五四文学的批判风采	(117)
第一节 拆解传统的激进姿态	(118)

II 五四文学的生成与可能

第二节 对传统文学的批判	(139)
第三节 对近世文学的清理	(167)
第四节 对传统伦理的挑战	(195)
第五章 五四文学的传统趋向	(211)
第一节 《新潮》与《国故》的抗衡	(212)
第二节 梁启超与胡适的争辩	(220)
第三节 新文化同人间的驳难	(231)
第四节 当下的审视	(245)
第六章 五四文学的创作实践	(252)
第一节 五四文学的创作品格	(252)
第二节 五四戏剧的兴起	(263)
第三节 五四散文的路向	(287)
第四节 五四新诗的样式	(312)
参考文献	(364)
后 记	(369)

第一章 五四文学的发生背景

第一节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一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第二卷易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移址北京）在上海创刊，一批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借助这份崭新的传播媒介，开始了“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的倡导，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变革。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由此拉开序幕并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得力于下列几个因素。

（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迫使庞大而已衰朽的大清帝国在血泊中蹒跚步入近代。殖民主义的侵略截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东方古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被

宰割、被掠夺、长期贫困落后甚至濒临民族危亡的时期。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形势，进一步促使中国人努力寻求和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先觉的士大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主动吸收西学的近代化历程。洋务运动模仿西方的“船坚炮利”，开矿筑路，介绍声、光、电、化等技术和自然科学。维新志士认为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宣传民权思想，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效仿实行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输入民主共和观念，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结束，虽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胜利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但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创造了政治条件。不过，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恢复帝制，出卖国家主权，共和政府实际上成为了一块空头招牌。

无论是科技引进的尝试，还是体制革命的实践，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失败境地，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给国人的刺激最为强烈。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清醒意识到封建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文化基础并未动摇，中国民众依旧处于愚昧、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与革命存在着厚重的精神隔膜。于是，思想启蒙被推向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前台。

（二）新型阶层的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在隙缝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据统计，自1912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8年的发展超过了过去的50年。棉纺织厂1915年15家，1922年增至64家；面粉厂在辛亥革命前37家，1912年

到1921年10年间新建117家。而造纸、丝织、印刷、火柴、运输、钢铁、修配、采煤、机器制造等部门也快速增长，社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急剧上升。力量有显著增长的中国资产阶级，反帝特别是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据估计，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已达250—300万人之多，势力随之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自然会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来，这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

（三）知识分子的独立

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兴办了各类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开始推广。而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的大量出现，文学市场得以形成，稿费制度更是直接促进了作家群体的扩大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改变了中国没有职业作家的传统，造就了一批以固定职业收入或稿酬为生活来源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一般认为中国报刊在19世纪下半期形成大潮，但1874—1895年自办的报刊也只有10种，而到1901年却达120种，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全国新兴的报纸达500余种，仅北京就有100种左右。我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是1872年的《瀛寰杂记》，后来的25年仅出现5种，而1902—1916年间则达57种之多。文学不仅在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出现了报纸文艺副刊和专门的文学杂志，这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自由发表言论的广阔天地。

大一统的封建思想统治局面已经土崩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言论出版相对比较自由的时期。因此，知识分子在传统仕途之外

就可以选择“思想”与“写作”等方式来体现自身价值或维持生计。在这种混乱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新型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潮，拓展文化视野，开始张扬自我个性，发表独立言论，反省文化传统，他们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人材条件基本成熟了。

（四）尊孔复古的逆流

虽然“五四”前夜思想环境比较宽松，但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尊孔读经声浪日盛。镇压“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就积极复辟帝制。一方面，修改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在1913年的宪法草案上居然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款；另一方面，发表“整饬纲纪”的宣言，宣布恢复学校“祀孔”、“读经”的命令以及表彰“节烈”、“孝行”的条例，公开提倡“祭天祀孔”，鼓吹“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次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①。1914年，北京政府的《教育纲要》竟然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封建余孽则大肆叫嚣“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组织，《孔教会》、《不忍》等鼓吹孔教主义的杂志也一一浮出水面，“孔子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中国之新命运系于孔教”等言论也风行一时。

在这股封建逆流面前，康有为竟以当代孔子自居，严复则陷入

^① 《祭孔告令》，载《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了封建复古思潮的逆流，许多介绍新学的人也偃旗息鼓成为了封建卫道士，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严重束缚和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逐步转型，一批接受西方思潮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勇猛的姿态发起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更为激进、更为猛烈的反封建、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二 新文化运动声势的扩大

1917年，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20世纪人类社会伟大的转折性事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这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并努力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审视国家命运。他们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注意力开始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更加注意苏俄的革命和文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宣传和论述科学社会主义，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9—1360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

的思想内容，表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正确选择。十月革命也激发了苦闷彷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士气和信心，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正是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①。

在这种情形下，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高一涵等于1918年1月或先或后加入了《新青年》第4卷以后各期的编辑工作，《新青年》编辑部开始设立，形成了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没有收回德国在山东夺取的利益，反而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军事上更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祺瑞）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不断壮大。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陆续出现了《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国民》等报刊杂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纷纷发表文章，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将批判视野从政体革命向思想革命、从政治觉悟向伦理觉悟转移，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思想文化，发表反封建和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文学作品，其左翼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坚力量，人们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新文化运动迅速蔓延开来，由此遭到了反对新文化的守旧人士刘师培、黄侃、林纾等人的抗阻和谩骂。《新青年》6卷1号刊载的《本志罪案之答辩

① 唐俟：《圣武》，载《新青年》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

书》、李大钊的《新旧思想之激战》、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①的宣言以及鲁迅的一系列杂文，表达了同旧人物、旧思想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在这场新旧思想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和巨大力量。

1919年5月，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并得到证实后，北京市民各阶层于3日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集会，讨论怎样抗议山东问题的无理解决，决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但学生们已经在筹备5月4日的示威游行了。5月4日，北京爆发了盛况空前的学生爱国示威运动。他们在天安门汇集，前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请愿，受阻后向曹汝霖宅进发，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32名学生的被捕，引发了学生的总罢课。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运动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变为了工人，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国内外。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新社团相继成立，《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日》、《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生活》周刊等报刊杂志纷纷出现。尽管各自立场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不仅达到了罢免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等直接的政治效果，而且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

^①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71页，中华书局1984年。

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拉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如果说 1918 年以前的《新青年》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占据指导地位，那么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五四”爱国浪潮则推动着无产阶级思想在以民主和科学为重要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中逐步占领了重要地位。虽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说也蜂拥而来，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势不可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占据了显著地位。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9 年 12 月《新青年》7 卷 1 号发表《本志宣言》，公开了重新确定的新方针。对于民主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的强调，表明它已注意把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关于“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的宣称，预示它已由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向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李大钊接连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在北京大学倡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 年 5 月，《新青年》进行改组，自 8 卷 1 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确定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宗旨，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不可低估。此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者在 1919 年至 1921 年间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与研究系就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社会主义展开的三次重要论争，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使新文化运动逐渐改变了自身思想性质，由属于世界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逐渐转变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逐渐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三 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发展

1921年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有二：

一是文学社团、刊物的活跃。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学革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作家队伍。有别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这类综合性文化团体、刊物的纯文学社团、刊物的纷纷出现，便是一个重要标志。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显示，1921年到1923年间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止，各种文学社团及刊物“不下一百余”^①，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民众戏剧社、弥洒社、南国社、狂飙社、湖畔诗社、湖光文学社、艺林社、绿波社、语丝社、沉钟社、未名社、新月社等文学社团，如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戏剧》、《弥洒》、《南国》、《狂飙》、《支那二月》、《湖光》、《艺林》、《诗坛》、《绿波》、《小说》、《语丝》、《沉钟》、《莽原》、《未名》、《诗刊》、《剧刊》、《新月》等文学刊物，这说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影印本），第5页，茅盾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明独立的新文学创作队伍已经形成。受各种文学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具有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以共同的文学趣味和文学目的、一致或相近的文学传统、同一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聚结文学社团，竞相创办各种纯文艺刊物，在同人刊物上宣传社团的文学主张与创作观念，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丰富着社团的文学理论，提高了新文学的创作质量，从而孕育出风格各异文学社团流派。大批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出现，有利于新文学战线的壮大，也有利于1922年至1925年间对南京“学衡”、北京“甲寅”等封建复古派的斗争。

二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渡。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社会面貌开始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中国革命加快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步伐，文学领域于1922年以后开始了革命文学的初期酝酿和倡导。

一方面是对苦闷、彷徨空气和倾向于文坛的不良影响的反拨，一方面是为了把文学纳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的轨道，一些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早期共产党人发出了倡导革命文学的呼声。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南京大会和1922年7月杭州大会上号召会员作家确信“主义”，“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使“文学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赏”^①；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上，发出

^① 参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第11期所载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南京大会上邓中夏的发言纪要和1927年7月杭州大会上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书面提案。

了“使文学艺术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号召^①；1923年6月创刊的《新青年》季刊《新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此外，《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觉悟》及其他进步刊物发表文章，如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文学与革命》，肖楚女的《艺术与生活》，沈泽民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沈雁冰的《文学者的新使命》，蒋光赤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文，从不同角度宣传革命文学主张。或提出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肯定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或指出革命文学揭露社会黑暗，表现斗争精神等方面的基本内容；或号召作家参加“革命的实际活动”，培养“革命的感情”；或主张反帝反封建的文学的联合战线；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情况。初期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虽然不够系统完整，一些见解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但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进步文学团体和作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五卅”以后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大批作家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出现了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和文学作品，如上海蒋光赤、沈泽民等人的“春雷社”，杭州之江大学学生的“悟悟社”，蒋光赤的诗集《新梦》、《哀中国》和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清晰地显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潮已逐步演化为无产

^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载《先驱》1922年5月第8期。

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

第二节 现代文化观念的滥觞

一 倡导民主和科学

适应思想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新青年》，为现代文化观念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媒体。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心内容，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它利用晚清以降译介的西方哲学、文学、社会学著作为思想资源，着眼于抨击旧（传统）文化、输入新（西方）文化的角度，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为反封建反复古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的文化革命。

发表在《新青年》1卷1号、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陈独秀就举起了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对青年们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①六点希望。这里所陈述的“六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第1卷第1号。